

本文件供閱卷員參考而設，並不應被視為標準答案。考生在註釋文件內容時應
小心謹慎。

全卷共六單元，每單元各設三題，學生從所選的一個單元中選答兩題，共答兩題完卷，每題各佔 25 分。

單元一：二十世紀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承傳與轉變

1. (a) 根據資料一，並援引史實，說明胡適提出的「整理國故」主張及其學術貢獻。(15 分)

胡適的「整理國故」主張：

- 胡適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存在大量迷信、不合現代需求的成分，應以科學態度和方法加以整理，去糟粕、取精華。資料一的演講中，他強調整理國故並非要摧毀傳統，而是將真正有價值的文化資源與現代思想結合。
- 胡適主張用實證主義的方法，即以歷史事實為基礎，運用邏輯分析和考據，糾正傳統文化中的虛構和錯誤。

胡適的學術貢獻：

- 胡適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提出用「科學方法」去整理國故，同時指出整理國故的步驟，成為整理國故運動的宣言，對整理國故運動有指導影響。
- 胡適親自參與了「整理國故」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文學方面，他進行了《水滸傳》、《紅樓夢》等中國古典小說的考據研究，並編寫了《白話文學史》，成為國學研究的典範。在哲學方面，他系統地研究了先秦諸子的思想，著成了《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這是第一部用現代學術方法研究中國古代哲學史的著作。

(b) 根據資料二，並援引史實，分析「整理國故運動」對中國傳統文化傳承與現代化的影響。(10分)

對傳統文化的貢獻：

- 文獻整理與保存：整理國故運動促進了中國古代文獻的系統整理與出版，例如《四庫全書》的校訂和出版，保證了傳統文化的延續。
- 批判性重構：顧頡剛等人在「古史辨」運動中，通過實證考據方法，對《尚書》《左傳》等傳統史書的神話成分進行批判，促進了歷史學的現代化。顧頡剛的《古史辨》系列文章質疑「三皇五帝」等傳說的真實性，表明整理國故運動重視事實和理性。
- 「整理國故運動」中總結出的治學原則和技術處理方法，既擴大學術研究的領域，又有助中國學術研究的現代化。運動同時促成國學研究機構成立，積極推動了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

對文化現代化的作用：

- 引入現代學術方法（如實證主義、科學分析），使傳統文化能夠符合現代學術要求，並與西方思想接軌。
- 白話文運動作為整理國故的延伸，使傳統文化內容更易於被普通民眾理解和接受。
- 梁啟超的「新史學」倡導以現代科學方法研究歷史，對學術界影響深遠。

2. (a) 試援引史實，分析 20 世紀 50 年代新儒家對西方文化的看法以及其對儒家思想的重新詮釋。(10 分)

- 西方文化可和中國文化結合，儒家有「天下為公」的概念，民主之發展正是成就「天下為公」；儒家有「利用厚生」的觀念，科學之發展正是成就「利用厚生」。中國文化應互相吸納優點，發展更理想的世界新文化。
- 批判和反思的態度，不完全同意西方文化，例如徐復觀批評西方近代文化的「異化」之特質，他甚至認為西方近代文化缺乏對人類的愛，表現而為一種反理性的思想傾向。唐君毅認為西方文化中的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與中國傳統價值觀相衝突，並主張中國文化應該回歸傳統，保持中國精神的純淨性。

(b) 試援引史實，分析改革開放後儒家文化在中國內地逐漸受到重視的原因。(15 分)

- 學者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文化大革命」對學術文化以致社會經濟各方面都做成嚴重的破壞。在四人幫倒台後，中國內地的學術界開始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進行反思。一些學者認為，近代中國所面臨的危機和困難是由於五四運動以來對本土文化傳統的拋棄所導致的；而另一些學者則直接歸咎於階級鬥爭的理論，並開始探討如何將馬克思主義與傳統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相結合。
- 社會氣氛的改變：改革開放後，政府提倡「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社會氛圍相對寬鬆，出現了「新啟蒙運動」、「文化熱」等潮流。第七個五年計畫（1986-1990）把「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列為主要課題之一，內地學者對傳統文化的研究越來越深入，中國儒家文化的研究和著作如雨後春筍般在內地興起。

3. 根據資料一與資料二，並援引史實，析論「文化大革命」(1966-1976 年)期間傳統文化受到的衝擊。(25 分)

- 與傳統文化決裂：「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發動了「破四舊」運動，指稱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都是由剝削階級製造出來毒害人民的，要徹底批判。
- 大肆破壞傳統文物與書籍：紅衛兵大肆破壞古蹟文物，搗毀神佛塑像、牌坊、石碑墓穴等，企圖全面破壞舊文化。大量書籍文獻被焚燒，學者被批鬥，學術研究停頓，傳統文化的承傳遭割斷。
- 全面否定孔子：1974 年爆發「批林批孔」運動，孔子被描繪為極端腐朽的沒落奴隸主階級代表，開倒車，搞復辟。「文化大革命」顛覆傳統價值觀，認為「仁者愛人」是虛偽的，傳統倫理價值蕩然無存。
- 儒家思想被視為「封建主義」的象徵，孔子成為主要批判對象，祭祀活動被禁止。
- 文化斷層：傳統思想和文化教育的中斷，導致年輕一代對傳統文化的認知出現真空。1976 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國逐漸開始反思運動的負面影響，1980 年代以來儒家思想和傳統文化重新進入公共視野。

單元二：地域與資源運用

4. (a) 根據資料一和資料二，從軍事和經濟兩方面，析論「秦中（即關中）」能成為「帝王州」的原因。（10 分）

- 關中四周形勢險固，自古以來便享有「金城千里」之譽。此語形容關中四周為高山、河川所環繞，地勢險要，猶如一道黃金鑄成的千里城牆。北有岐山、嵯峨山等山脈，就如資料二所說「足以自守」；南有秦嶺，「道路險阻，非棧道不能通行」；西有隴山，「隘阻東西」；東有黃河為屏障。這些天然險阻之間，又設有函谷關、潼關、武關、大散關等隘口要地，均為兵家必爭之地。因此，自戰國以來，關中便被譽為「四塞之國」，其軍事防禦能力尤為突出，張良所言「金城千里」正是對關中地勢的精準概括。
- 此外，對於一個政權而言，國都的地點不僅要易守，更須便於掌控全國。唐中葉以前，中國的政治、經濟重心多集中於黃河中下游地區，而關中位於「扼東西交通要衝」之地，便於中央對全國的控制。向東南，關中可掌控中原和江淮地區；向西北，則可守護長城防線，並對西域施加影響。因此，關中特殊的地理位置，既可防禦外敵，又能輻射全國，成為歷代建都的理想之地。
- 關中富饒之地，自古被譽為「天府之國」，意指其物產豐饒，有如天之府庫。關中經濟富庶的首要原因在於「沃野千里」，土壤肥沃，非常適宜農業生產。農業在古代經濟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關中優異的自然條件為糧食生產提供了可靠保障。此外，關中河道縱橫，灌溉便利。早在戰國時期，秦國便開鑿了鄭國渠，「灌田四萬餘頃」，以此富國強兵，終助秦國一統天下。其後，歷代政權又陸續開鑿了六輔渠、白渠、龍首渠等水利工程，大大促進了關中的農業發展，為建都於此的政權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b) 根據資料二和資料三，並援引史實，評析古代統一王朝定都關中的得失。(15分)

- 得：關中四周地勢險固，自古為「四塞之國」，具有極大的軍事防禦價值。「左崤函，右隴山，前有巴蜀，後有胡羌，形勝之地也。」(《史記·秦本紀》)北有嵯峨山與岐山，易於設險防守；南有秦嶺高山阻隔，道路險峻，非棧道不能通行；西有隴山，隘阻東西；東有黃河為天然屏障，並設有函谷關、潼關等險要關口。在這些地理條件下，關中成為易守難攻的「金城千里」，能有效抵禦外敵入侵。如秦國憑藉關中之險，實行「遠交近攻」戰略，最終一統天下商人貿易的重要場所，各種文化和商品在這裡匯聚，豐富了唐代的文化多樣性。「扼東西之衝，控南北之會。」向東可掌控中原和江淮地區，向西北則可防禦匈奴等游牧民族，並進一步影響西域。以漢唐為例，西北外族為患，尤其是突厥、吐蕃。關中地近西北邊防，有助集中保衛京師及邊防兵力，防禦外族。唐太宗以關中長安為軍事中心，積極備戰，最終打敗了突厥，解除邊患。
- 失：唐代安史之亂後，關中農業遭到嚴重破壞，經濟實力大不如前，而江南地區則日益繁榮，成為全國的經濟重心。正如資料三所言：「唐中葉以後，關中地區經濟衰退，東南地區成為經濟重心」，這使京師長安的物資供應愈加困難。長安遠離江南富庶之地，運輸問題尤為艱巨，需經過黃河三門峽等險要地段，耗時費力，導致中央政權財政壓力加大。
- 雖然關中地勢險要，但其北臨游牧民族，邊疆壓力始終存在。漢唐等朝代需長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維護長城防線，並駐守邊疆，這對關中地區的資源消耗極為嚴重。例如，漢武帝時期為抵禦匈奴，連年用兵，使關中地區負擔沉重，最終導致社會經濟受到拖累。定都關中也使統治者忽略東北邊防安全。以唐朝為例，據學者王小甫在《隋唐五代史》分析，唐初奉行「關中本位政策」，對東方採取維持現狀的消極政策。因此，盛唐時對外戰爭的成就，以西北為大，東北方面，則成效不彰。

5. (a) 根據資料一和資料二，分析隋唐以來運河對南方經濟開發的作用。(10 分)

- 商貿蓬勃：根據資料一，商業蓬勃也是製瓷業興盛的重要原因之一。唐中後期，南方商業發達，對瓷器的品種、素質要求日益提高，因而刺激了製瓷技術的發展。另一方面，安史之亂後，西北邊族吐蕃、回紇崛起，陸上絲路阻絕，使中外貿易轉向海路發展。瓷器一直是中國出口商品的大宗，而南方的瓷窯大多靠近港口，運輸方便，遂成了重要的產瓷區，進而推動江南製瓷業的發展。
- 北方戰亂不斷：根據資料二，安史之亂後，北方藩鎮林立，戰亂頻仍，使黃河中下游一帶的城市受到極大摧殘。相反，南方由於政局相對穩定，戰亂較少，經濟遂得以蓬勃發展，並形成了不少商業都會。以資料二的揚州為例，它之所以在唐代後期「成了全國首屈一指的經濟都會」，一方面是由於它鄰近運河，交通便利，經濟發達；另一方面也因為長安、洛陽等城市飽受戰火摧殘，經濟發展速度追不上南方城市。
- 運河促進開發：資料二商業都市的興起與繁盛，也與運河的建設有關。中國境內的江河，大多數由西向東流，南北之間的水路交通十分不便。隋朝先後修築了多條運河，這不但打破了南北地域隔閡，推動兩地經濟、文化交流，同時也促進了南方的開發。事實上，自運河開通後，運河沿線興起了許多商業城市，其中以揚州最為繁華。揚州位於長江、運河和東海的交匯處，既是全國最大的物資轉運站和集散地，也是工商業發達的城市。益州亦是唐代西南重鎮，自古即有「天府之國」的稱號，物產豐富。唐代後期，揚州和益州取代了長安和洛陽，成為當時貿易的中心，所以有「揚一益二」的稱號。
- 從以上所述，唐後期江南的手工業和商業能取得重大發展，主要與前代奠定基礎、商貿蓬勃發展、北方戰亂不斷和運河促進開發等幾個因素有關。上述因素使長江流域的手工業和商業逐漸取代黃河流域，成為全國的經濟重心。

(b) 有人認為隋唐以後，運河的建設促進了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試援引史實加以分析。
(15 分)

- 唐代後期，南方農業生產迅速發展，尤其是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大規模農田開墾和水利建設，使得南方成為全國最重要的糧食供應地區。資料二提到唐代全國水利工程中，有 78% 分布在南方，說明南方農業的發展速度遠超北方。安史之亂後，北方長期戰亂，農業生產遭受重創，而南方因政局相對穩定，農業發展得以延續。稻米逐漸取代小麥成為全國的主要糧食來源，大量稻米經由運河運往北方，成為中央政府財政和軍事的支柱。例如，唐代中後期「以東南之糧餉，養西北之士馬」，反映了南方在全國經濟中的樞紐地位。
- 隋唐以來，南方手工業依靠運河的便利交通迅速發展，並逐漸取代北方成為全國手工業的中心。隋唐時期，長江流域的越窯青瓷因運輸便利而遠銷全國，並成為中國的主要出口商品。揚州等城市不僅是手工業產品的集散地，也是製造業的中心。安史之亂後，北方手工業因戰亂遭受破壞，而南方手工業則依托穩定的社會環境和便利的運輸條件持續發展，逐漸佔據全國的主導地位。
- 運河的建設為南方城市經濟的繁榮提供了條件。資料一提到，揚州作為運河與長江的交匯點，成為南北物資交流的中心，也是唐代最繁榮的商業城市之一。唐末五代時期，杭州、泉州等城市也因運河和海運的發展而迅速崛起，成為當時的經濟樞紐。隨著南方商業的繁榮，南方城市逐漸取代北方城市成為全國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例如，唐代後期，「揚一益二」的說法反映了揚州和成都的商業地位已超越了長安和洛陽。
- 隋唐以後，中央政府的財政逐漸依賴南方。資料二提到，安史之亂後，北方經濟疲弱，朝廷不得不依賴南方的賦稅和糧餉來維持軍政開支。五代時期，中原地區經濟凋敝，北方政治重心也向南方靠攏，例如五代後期的開封成為政治中心，進一步反映了經濟重心的南移。

6. (a) 根據資料一和資料二，分析唐宋時期市舶司的設立對廣州外貿秩序及經濟發展的影響。
(10 分)

- 資料一指出，市舶司的主要職能是「掌蕃貨，海舶、徵榷、貿易之事」，即：(1) 管理進出口貨物，確保貿易規範化；(2) 徵收商稅，為中央財政提供穩定收入；(3) 監管外商的進出港口，避免非法交易，維護貿易秩序；(4) 招徠外商，促進中外物資交流。這些職能的實施，使廣州的貿易活動更加有序，吸引了更多外商前來貿易。
- 唐之前，廣州的外貿事務由刺史兼管，導致官員濫用職權、壟斷買賣、貪污舞弊等問題，貿易秩序混亂。唐代設立市舶使後，廣州的外貿秩序得到改善，外商來華貿易更加便利，廣州迅速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宋代以來，隨著市舶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廣州的外貿管理更加規範，貿易秩序更加穩定。
- 資料二顯示，北宋時廣州的市舶收入約為 40 萬緡至 70 萬緡，南宋時增至 120 萬緡，成為朝廷市舶收入的主要來源地。這表明，市舶司的設立不僅促進了廣州的貿易活動，也大幅提升了其在全國經濟中的地位。廣州作為外貿中心，吸引了大量外商和本地商人，帶動了當地的手工業、航運業和城市經濟的全面發展。

(b) 有人認為，廣州的地理環境是其自古以來成為中國海上貿易中心的重要原因。試結合資料與史實，分析廣州地理條件如何促進其外貿繁榮。(15 分)

- 廣州位於珠江下游，鄰近南海，是東南亞與中國內地貿易的必經之地。珠江三角洲水網密布，內河航運發達，使廣州能夠連接中原地區的經濟腹地，成為中國南方的重要商品集散地。此外，廣州靠近東南亞航線，在古代航海技術有限的情況下，外國商船往往選擇停靠廣州，這使廣州成為外商來華的首選港口。
- 廣州地處亞熱帶，氣候溫暖濕潤，農業和手工業發達，為貿易提供了豐富的商品基礎。廣州出產的絲織品、陶瓷、香料等深受外國商人歡迎，成為對外貿易的主要出口商品。此外，珠江三角洲的漁業和航運業發達，提供了充足的物資和技術支持，進一步促進了外貿的繁榮。
- 廣州既是河港又是海港，能夠同時連接內陸與海外市場。珠江流域的水運網絡使廣州與長江、黃河流域的經濟中心保持緊密聯繫，而南海航線則將廣州與東南亞、南亞和阿拉伯國家連結起來，形成了內外兼備的貿易格局。正因如此，唐宋時期廣州成為了中國與東南亞、印度洋地區貿易的主要樞紐。
- 自秦漢以來，廣州的地理優勢就已顯現。隋唐時期大運河的開通進一步密切了廣州與中原地區的聯繫，而唐代市舶使的設立則開創了廣州外貿繁榮的新局面。宋代以後，廣州的地理優勢繼續鞏固其在中國海上貿易中的核心地位。南宋時，廣州的市舶收入占全國市舶總收入的很大比重，充分說明了其在外貿中的重要性。

單元三：時代與知識分子

7. (a) 根據資料一，並援引史實，分析孔子的政治思想及其在教育中的應用。(15 分)

- 孔子認為，政治的核心應是道德，而非武力。他提出「為政以德」，認為君主應如北辰（北極星）般，以自身的德行感召百姓。他曾在《論語》中指出：「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說明孔子重視道德感化，主張用「禮」維持社會秩序，而不是依靠刑罰。他認為，刑罰只能使人民畏懼，但不能使其內心感到羞恥，無助於長期穩定的統治。
- 孔子強調教育的作用是培養有德之人。他主張「因材施教」，根據弟子的性格與能力進行針對性指導。例如，對顏回，孔子讚揚他「不遷怒，不貳過」，認為他善於自我反省；對子路，孔子則注重約束其魯莽的性格，強調謹慎行事。孔子還要求弟子學習經典如《詩》、《書》，並從中領悟治國理政的道理。他認為教育的最終目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培養既有道德又有實踐能力的人才。
- 雖然孔子生前未被重用，但其「仁」、「禮」的思想對後世影響深遠。漢代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正是將孔子的政治思想作為治國理政的基石。此外，科舉制度也繼承了孔子重視教育和人才選拔的理念，成為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b) 承上題，試結合春秋時期的社會背景，分析孔子政治思想難以被當時統治者接納的原因。(10 分)

- 孔子的政治思想適用於和平穩定的社會，但春秋時期諸侯爭霸，國家之間的競爭以武力為基礎。統治者更重視實用性的軍事力量，而非道德感化。例如，齊桓公任用管仲，以「富國強兵」為治國核心，強調經濟與軍事實力的提升，而非德治與禮治。
- 春秋時期，「禮崩樂壞」成為普遍現象。諸侯僭越王室權威，君臣、父子等傳統倫理秩序逐漸瓦解。在這樣的背景下，孔子提倡「克己復禮」，希望恢復周禮以重建社會秩序。然而，當時各國統治者更關注如何強化自身權力，而非恢復傳統禮制，導致孔子的思想缺乏現實吸引力。
- 春秋戰國之際，法家思想逐漸興起，強調以法治國，重視效率與權力集中。例如，戰國時期的商鞅變法通過嚴刑峻法使秦國富強，為後世統治者提供了成功的經驗參考。而孔子的「為政以德」則被認為過於理想化，難以滿足當時統治者對速效的需求。
- 孔子在推行自己的政治思想時，缺乏實權與影響力。他曾試圖在魯國實行德治，但因三家權臣（季氏、叔孫氏、孟氏）的壟斷而失敗，甚至被迫離開魯國四處遊說。然而，其他諸侯國如衛國、曹國等也未能接納他的主張，最終孔子只能以教育為重心，未能實現其政治抱負。

8. (a) 根據資料一，並援引史實，分析王安石的經濟思想。(10 分)

- 北宋部分士人受儒家傳統影響，將「道義」與「貨利」視為對立的觀念，認為追求財富有悖於道德，因此忽視理財的重要性。然而，王安石認為理財並非與義對立，提出「為天下理財」，主張以仁義為基礎進行理財。他指出，當時社會雖然工商業繁榮，財富與資源不乏，但國家財政困難、百姓生活窘迫、貧富懸殊的問題依然存在，其根源在於理財不善。王安石認為，只要以義理財，便可實現國家富強與百姓富足的雙重目標。
- 理財的核心在於開源與節流，而王安石更重視開源。他認為，節流雖然能減少浪費，但不足以解決國庫空虛的根本問題，必須通過發掘潛藏的自然和社會資源，增加國家的收入。如資料所述，他的理財方針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認為應善用自然界與民間的力量，把潛在的財富盡可能轉化為實際資源。

(b) 試援引史實，析論王安石如何在熙寧變法中實踐其理財方針。(15 分)

- 農田水利法：王安石認為農業生產是經濟發展的基礎。農田水利法是鼓勵百姓開墾農田，興修水利，這便是把潛存於自然界的資源發掘，善加利用。若民間財力不夠，則可向官府借款，利息 10%。這便是結合天下（民間和官府）的勞動力、財力、智力等，促進生產，從而生天下之財，包括增加官府收入，改善人民生計。
- 青苗法：在青黃不接時，由官府借貸錢穀予民，利息 20%。通過低息貸款使農民能夠獲得生產資金，既減輕了民間高利貸的剝削，也為國家增加了收入。
- 方田均稅法：重新丈量土地，並按肥瘠情況分為五等，按等徵稅。讓國家重新掌握土地及賦稅資料，減少富戶逃稅現象，確保稅收更加公平。
- 均輸法：轉運使先了解京師所需，按各地情況，在豐收、價賤、路程較近之地採購物品。此法可確保京師物資充足，節省運費，並調節各地的物資供求和物價。
- 市易法：設市易務，實行平買貴賣，調節市場供應，平抑物價。此外，小商戶可向市易務賒購物品，但要以產業抵押及支付利息。此法可避免大商賈操控市場，又可增加國庫收入。

9. (a) 根據資料一和資料二，並援引史實，試分析梁啟超從政失敗後轉向學術與思想啟蒙的原因。(10 分)

- 梁啟超自 1895 年參與公車上書以來，長期致力於推動政治改革。他曾參與戊戌維新運動，並與康有為共同創立保皇會，推動君主立憲。然而，戊戌變法失敗後，他被迫流亡海外，政治抱負難以實現。清朝滅亡後，梁啟超回國參與民國政治，組建進步黨，並出任司法總長和財政總長等職位。然而，進步黨的活動間接助長了袁世凱的帝制運動，令他感到無法勝任政治改革的重任。正如資料一所言，他在政壇上「發生了意外的惡影響」，且「不能勝任」，感到理想未能達成，遂對政治感到灰心。
- 梁啟超深刻認識到，政治改革的根本在於國民素質的提升。他認為，中國社會「墮落，風俗敗壞」，要推動政治建設，必須從思想與文化入手。因此，他提出通過教育和學術研究來「講求人所以為人、所以為國民的道理」。資料二中，他表明自己「心思才力不能兩用」，無法同時兼顧從政與文教事業，決定致力於學術與言論，以此啟迪國民，推動社會進步。他認為，這是報效國家的另一種方式。

(b) 有人認為，梁啟超退出政壇後，仍通過學術與言論對中國的政治與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試據有關史實，加以析論。(15 分)

- 梁啟超退出政壇後，致力於教育事業。他在北京大學、清華學校等院校任教，積極培養青年人才；同時，他還在全國多地演講，提倡思想啟蒙。他認為，提高國民的政治素養是推動國家進步的基石。資料一中，他提到「將講求人所以為人、所以為國民的道理」，通過教育向學生傳遞現代公民意識與政治責任感。這些學生日後成為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間接推動了中國政治的發展。
- 梁啟超退出政壇後，仍以文字為武器，發表大量學術與思想著作。他的著述涵蓋史學、哲學、法律等領域，對中國現代化的思想進程產生了深遠影響。例如，他在《歐遊心影錄》中批判專制，提倡思想自由，啟發了一代知識分子對政治與社會問題的思考。雖然資料二提到他「較少發表政論」，但他的學術作品中仍滲透了對政治的深刻見解，這些思想促使更多人參與政治改革，推動了中國政治的進步。
- 梁啟超雖然退出政壇，但仍然關注國事，適時發表意見。例如，1925 年「五卅慘案」發生後，梁啟超與其他知名人士聯名發表宣言，抗議外國勢力對中國的壓迫，並針對局勢提出建議。此外，他也常在時局緊張時發表文章，對政府政策作出點評。梁啟超的言論因其個人聲望而廣受關注，即使退出政壇，他的影響力仍然不容忽視。

單元四：制度與政治演變

10. (a) 試從土地分配與使用規定兩方面，析論資料一所述的唐代對土地的「嚴格控制」，並說明這對唐初社會經濟的影響。(10 分)

- 唐代均田制規定，根據人口與身份分配土地。例如，《唐律疏議》記載，一般農民可獲分配口分田，每人 80 畝；奴婢則可分 40 畝。此外，身份較高者如官吏與軍人，則可獲得更多的職分田。這種分配方法旨在避免土地兼併，確保土地資源的公平分配。同時，對於超過規定佔田額的行為，政府設有嚴厲的處分措施，《唐律》有「佔田過限者，一畝笞十，十畝加一等……諸在官侵奪私田者，一畝以下杖六十，三畝加一等」的規定。這些規定使地主權貴難以恣意兼併土地，擠壓普通農民的生存空間。
- 唐代對土地的使用也作出了詳細規定。例如，農民不得隨意棄田，若有棄耕行為，需接受處罰；對於未經許可的土地買賣，政府會進行查處，甚至沒收土地。《唐律疏議》中提到，若以土地作抵押，限期內未贖回者，土地將被收歸國有，防止土地流失至富人或外部勢力手中。唐代均田制亦有鼓勵百姓往寬鄉開荒的安排，甚至規定若田地荒廢，戶主和官吏要受罰，藉此使人們積極生產。事實上，推行均田制後，有大量荒地變成農田，上述措施使百姓生活得到保障，農業生產亦得以穩步發展，編戶由是大增，唐代戶數從高祖武德年間的二百多萬增至玄宗天寶十三載的九百多萬；唐朝社會更出現了糧價穩定、百姓「人家儲糧，皆及數歲」的盛況。

(b) 根據資料一與資料二，並結合史實，比較唐代均田制與北魏均田制對土地買賣的規定有何不同，並分析唐代土地買賣規定對均田制推行的影響。(15 分)

- 北魏均田制規定，露田不可買賣，多餘的桑田可以變賣，授田不足者可以補買，但不可賣掉所受之田，不可買超過應受田的數額，更有官吏貴冑因非法佔田而獲罪。另外，《魏書·食貨志》記載，農民死亡後，土地需歸還國家並重新分配，這一規定即「死者還田」。這種嚴格限制旨在防止土地兼併，維持土地分配的公平性，但也降低了土地的流動性，可能不利於農民根據自身需求調整土地分佈。
- 唐代均田制對土地買賣規定雖然繼承了北魏的基本原則，但有所放寬。例如，資料一提到，唐代允許在一定條件下的土地買賣，但對於超出規定佔田額或未經批准的交易，仍設有嚴厲的處罰措施。此外，《唐律疏議》中提到，土地可用作抵押，但若限期內未贖回，土地將歸官府所有，這一規定兼顧了土地流動性與國家利益的平衡。
- 唐代土地買賣規定的適度放寬，使得土地流動性有所增加，能夠適應部分農民的經濟需求，有利於經濟發展。然而，這也為土地兼併現象的復燃埋下了隱患。隨著唐代中後期政治控制的削弱，土地買賣逐漸失控，均田制最終名存實亡，導致大量土地集中於豪強手中，百姓普遍授田不足，例如《敦煌籍帳》記載自武后大足元年至玄宗天寶六載的 43 戶資料，每戶平均僅獲授應受田額的 30.5%。這導致百姓生活日困，甚至逃亡，成為流民，對唐代後期的社會穩定造成了重大衝擊。

11. (a) 試從資料一出發，分析秦代兵制和唐代府兵制如何體現徵兵制的「義務性」，並比較兩者在徵召人選上的不同。(10 分)

- 資料一指出，徵兵制的核心特點在於「義務」，即符合條件的居民需依法服兵役。秦代兵制體現了徵兵制的普遍性與強制性。《史記·秦本紀》記載，秦代規定年滿 17 至 60 歲的男子均需服役，無論身份貴賤，皆有兵役義務。這種做法確保了國家的兵源充足，為秦國統一六國奠定了基礎。
- 唐代府兵制同樣體現了徵兵制的「義務性」。《舊唐書·兵志》記載，府兵主要由中小地主和自耕農組成，需「身家清白」且具有一定經濟基礎的男子入選。他們平時務農，戰時服役，既是士兵，又是農民，形成了「兵農合一」的制度。這種義務性不僅提供了穩定的兵源，還減輕了國家對軍費的經濟壓力。
- 秦代兵制的徵召範圍較為廣泛，所有編戶齊民均需服兵役，僅按體力強弱分配任務，壯丁從軍，老弱擔任後勤工作（如運輸、築城）。這種廣泛徵召方式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國家的人力資源。
- 相比之下，唐代府兵制的徵召條件更為嚴格，僅限於「強壯有力」的中小地主和自耕農，且需「身家清白」。這意味著貧民和無產者基本被排除在外，徵兵範圍相對縮小。唐代府兵制強調兵員素質，但也因此限制了兵源的廣度。

(b) 有論者認為徵兵制存在諸多弊端，不利於政權穩定。試以唐代府兵制為例，結合史實，加以析論。(15 分)

- 優點：唐代府兵制是一種兵農合一的徵兵制度，平時府兵務農，戰時服役。這種制度初期運行良好，既減輕了國家的軍費壓力，又確保了軍隊的穩定供應。《舊唐書·兵志》記載：「府兵平時不受俸祿，耕於田，戰時乃召之。」這種模式有效地結合了生產與軍事，減少了對國家財政的負擔。
- 缺點：府兵需自備武器和裝備，這對中小地主和自耕農構成了沉重負擔。隨著土地兼併日益嚴重，許多自耕農破產，無法再承擔兵役義務，導致府兵制兵員減少，軍隊素質下降。唐高宗以後，均田制漸被破壞，加上勳賞過濫、征戍期又因邊事繁重而不斷延長等原因，富裕人家都不願當府兵。他們或是逃亡，或是找來貧弱者代役，而官府亦常強徵貧弱百姓以補足兵員，終導致越來越多貧弱者當府兵。這不單使府兵戰鬥力低落，亦促使大量府兵以至一般百姓因無法負擔兵役所需開支而逃亡，終導致府兵制因而無法運作。
- 府兵需長期服役，且多次遠征邊疆。如《資治通鑑》記載，唐玄宗時期府兵需遠赴西域作戰，導致「兵家疲困，無復生機」。長期的徵調不僅影響了兵員的農業生產，還加劇了地方經濟的困頓，導致社會矛盾加劇。
- 府兵制依賴地方兵府的管理，但隨著制度的老化，地方管理效率下降，兵員調度不靈。如安史之亂前夕，府兵制已無法應對緊急的軍事需求，朝廷不得不依賴募兵制來彌補兵源不足。

- 府兵制的崩潰直接導致唐代後期軍事力量的削弱。隨著府兵制的瓦解，國家不得不轉向募兵制，但募兵制依賴將領掌握兵權，最終形成了藩鎮割據的局面，對唐代的政權穩定構成了嚴重威脅。

12. (a) 根據資料一，並結合史實，分析宋代科舉制度對人才流動和社會階層消長的影響。(15分)

- 宋代科舉制度的改革注重公平性，為寒門學子提供了更多機會。資料一提到北宋實行糊名法與誊錄法，考試過程中屏蔽考生姓名與卷面字跡，甚至解衣搜身等，減少了權貴舞弊的可能性。考生考試又需依榜就坐，不得移易，防止士子私相傳授；朝廷對考官的權力亦加以牽制，加設副主考。這些嚴密的防弊安排，都令科舉更公平客觀，有助朝廷吸納真才。例如宋仁宗時期，科舉中進士的寒門子弟比例顯著增加，寒門學子通過努力獲得了進入仕途的機會，打破了唐代以來官僚階層「世家壟斷」的局面。
- 宋代科舉制度取消了唐代對出身的限制，「罷行卷」，實行「一切考諸試篇」，不再區分士族門第，所有士人均可參加科舉。此外，朝廷對官宦子弟另開「別頭試」，並嚴令不許請託；授官前設「殿試」，由天子親自考選。
- 宋代每三年舉行一次科舉，參加者來自全國各地，通過考試進入朝廷後，地方士人能夠將基層民意帶到中央。同時，地方上因科舉而產生的讀書風氣也帶動了基層文化的普及。例如，宋代著名學者蘇軾和歐陽修均通過科舉進入仕途、宋神宗時期著名改革家王安石出身寒門，其子弟也通過科舉成為朝廷重臣。科舉制度成為寒門階層和地方精英進入中央政權的重要渠道，促進了社會階層的流動。

(b) 根據資料二和資料三，並結合史實，闡析清代科舉制度的內容。(10分)

- 清代科舉分為四個主要階段：童試：又稱「入學試」，由地方官主持，合格者稱生員（秀才），可進一步參加科舉考試。鄉試：每三年一考，舉行於各省省城，合格者為舉人。會試：於京城舉行，由禮部主持，合格者稱貢士。殿試：由皇帝親自主持，最終定進士名次，分為一甲（狀元、榜眼、探花）和二甲、三甲。殿試一般不設黜落，一甲者獲授翰林院官職，二、三甲者須參與「朝考」，再依成績高下授官。
- 資料三提到，八股文是清代科舉的標準文體，是一種對偶文體，考生需用古人語氣和對偶體式寫作，文章的結構應包括八部分，分別是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考題範圍主要出自「四書」、「五經」，以程朱注本、《御纂四經》等官方儒家經典版本為答題的根據，清廷還頒布《欽定四書文》作為八股文寫作的規範。這種文體檢驗了考生對儒家經典的熟悉程度，但也限制了思想創造力。

13. (a) 根據資料一，並結合史實，簡述南北朝時期道教徒如何對道教進行改革。(15 分)

- 南北朝時期，道教徒對道教教義進行了系統化整理，吸收儒家和佛教思想，提升了道教的理論高度。例如，南朝的陸修靜（406-477 年）編纂了《三洞經錄》，首次系統整理了道教經典，確立了「三洞」經典體系（洞真、洞玄、洞神），為道教的教義體系化奠定了基礎。他還將儒家倫理融入道教，強調忠孝仁義，使道教更符合當時士族階層的價值觀，提升了道教的社會接受度。另外，陸修靜更把皇朝的服飾制度引入道教，以鞏固道教內部的等級制度。最後，是完善道教的齋醮儀範，陸修靜總結了前代的齋儀，確立了「九齋十二法」的齋醮體系，闡發了齋醮科儀的意義，即要去除邪念，使心神安靜。
- 道教徒對宗教儀式進行了標準化改革，建立了更為規範的宗教儀典。例如，北魏的寇謙之（365-448 年）改革了早期天師道的宗教儀式，廢除了「醮祭拜鬼」，廢除二十四治稱號，革除租米錢稅制度，反對男女合氣之術等民間迷信行為，創建了更符合上層社會需求的齋戒儀式。他還倡導簡樸的宗教生活，強調道教徒需遵守戒律。最後，寇謙之借助北魏太武帝的政治力量，把道教變成國教，太武帝更親往道壇受道教符籙，天師道因此大盛。
- 門閥士族的參與是南北朝道教改革的重要推動力量。士族階層以其文化素養和政治地位，為道教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例如，南朝的陶弘景（456-536 年）不僅是道教理論家，還是著名的政治顧問，他將道教與政治緊密結合，提出了「上清靈寶」體系，進一步提升了道教的政治地位。陶弘景在茅山隱居 45 年，廣招徒眾，弘傳《上清》經法，撰寫了《真誥》、《登真隱訣》等著作。其次是建立神仙譜系，陶弘景在《真靈位業圖》一書，將儒家的等級思想引入道教教理，建構了一個等級有序、統屬分明的道教神仙譜系。

(b) 有人認為南北朝時期道教向官方宗教演變對道教來說是利多於弊。試據史實加以分析。
(10 分)

- 道教在南北朝時期逐步成為被官方認可的宗教。例如，北魏太武帝於道武帝太延五年（439 年）下令推崇道教，並封寇謙之為「國師」。這使道教得以參與國家的政治與文化建設，提升了其社會地位與影響力。
- 道教在士族領袖的推動下完成了教義與組織的系統化。例如，陸修靜的經典整理與寇謙之的儀式改革，使道教擺脫了早期的「巫覡化」特徵，成為具備完整教義體系的宗教，吸引了更多信眾的加入。湯一介提出道教在這時期完成了以下五方面的大事：1.整頓和建立道教的教會組織，如陸、寇二人對天師道的整頓；2.為道教建立和完善其宗教教義的理論體系，如陶弘景對《上清》經法的弘揚；3.編纂道教經典，如陸修靜的《三洞經書目錄》、陶弘景的《真誥》、《登真隱訣》；4.制定和完善教規教儀，如陸修靜對齋醮儀範的完善，以及寇謙之戒律教儀的增訂；5.編造神仙譜系和傳授歷史，如陶弘景的《真靈位業圖》。
- 南北朝道教向官方宗教演變為道教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契機，提升了其地位與影響力。然而，過度依賴官方支持和政治化傾向，也使道教面臨教義僵化與發展受限的問題。總體而言，這一轉變利大於弊，因為它為道教的長期發展奠定了基礎，但也暴露出需要平衡政治與宗教關係的挑戰。

14. 試援引史實，析論北朝佛道之爭的原因。(25 分)

- 北朝時期，胡漢文化衝突尤為激烈，宗教之爭正是此矛盾之一端。漢人自視為「中華正統」，以道教為本土宗教，認為為中國文化之代表，而胡人則多奉佛教為信仰，視之為胡族文化之重要部分。道教與佛教之爭，實與胡漢之間的文化角力相表裡。北魏滅佛一事正可為例。魏太武帝之時，漢人士族崔浩為推崇本土文化，極力支持道教，並打壓佛教，促使太武帝於太平真君七年（446 年）下令滅佛。此舉不僅為宗教之爭，亦為漢胡貴族權力鬥爭之延續，鮮卑貴族長孫嵩之失勢正可見其端倪。是故，華夷之辨為佛道之爭之重要根由。
- 佛、道二教教義各異，追求迥然不同，亦為爭鬥之根本。佛教重涅槃解脫，主張超脫輪迴，得「心靈之安寧」；道教則追求長生不死，尊肉體成仙。二者修煉方式不同，思想上南轅北轍，故而爭論不休。北周滅佛即為一例。周武帝寵信道士張賓，受其鼓吹，認為佛教思想有害於國本；又因還俗僧衛元嵩對佛教多有攻訐，終於於建德三年（574 年）下令滅佛，尊道抑佛。由此可見，教義之分歧與宗教之爭密不可分。
- 北朝佛、道二教爭相利用帝王與士族之勢力，以擴大自身影響力，致使宗教之爭與政治權力之爭相互交織。後趙之時，佛圖澄以咒術與方術獲石勒、石虎之信任，令佛教大盛於北方，寺廟林立，僧侶漸多；而北魏時，寇謙之得崔浩推舉，成功使太武帝信奉道教，並於天師道基礎上改革，創立新天師道，壓制佛教發展。佛、道爭奪帝王信任，互相攻訐，甚至引發朝廷滅佛或滅道之事。北朝佛道之爭，實為權力鬥爭之映射。
- 北朝佛教寺院因受布施、賞賜，積累大量土地與財富，導致寺院經濟規模迅速擴大。僧侶因受免役優惠，不參與生產與兵役，致使國家稅收減少，兵源匱乏。道教徒遂以此為由，指責佛教危害社會利益，借以說服統治者打壓佛教。北魏滅佛即與此相關。當時佛寺土地過多，僧侶免稅，影響國庫收入，崔浩等道教支持者藉機勸說太武帝滅佛，沒收寺院財產充實國庫。道教以此保障自身發展空間，並擴大經濟利益。

15. 根據資料一，並援引史實，析論明末清初天主教在華蓬勃發展的原因。(25 分)

- 利瑪竇進入中國後，不僅建造教堂，還刻印書籍以傳播教義，並與士大夫階層建立良好關係。耶穌會會士深諳文化融合之道，在傳教過程中極力適應中國文化，消除文化隔閡。例如，利瑪竇初入中國時，曾以「番僧」形象示人，但他很快發現士大夫階層才是中國社會的核心，於是改換儒服，融入士紳階層，贏得尊重。此外，他改漢姓、學漢語，甚至運用儒家經典名詞解釋天主教教義。例如，他以「天主」稱呼上帝，並以《四書》《五經》為基礎闡釋基督教思想，讓中國士人更易接受天主教。其在明神宗時期取得了顯著成效，教徒人數從最初的 500 人增至 2,000 人，主要分布於廣東沿海及北京等地。
- 更重要的是，利瑪竇對中國傳統禮儀採取包容態度，認為中國信徒崇祖祀孔屬於社會禮儀，並非偶像崇拜，因而不禁止。此舉既保留了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也減少了天主教教義與中國傳統風俗間的摩擦，為天主教的傳播鋪平了道路。
- 耶穌會會士以其卓越的科技知識，成功贏得中國統治者與知識分子的信任。例如，利瑪竇帶來了世界地圖、天文儀器及西方數學知識，令明神宗對其學識大為推崇。清初湯若望與南懷仁則以天文曆法及火炮技術獲得清廷重用。這些成就不僅提升了傳教士的社會地位，亦為天主教的發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清初時，順治帝對湯若望禮遇有加，湯氏甚至被任命為欽天監監正；南懷仁則因改良火炮技術而深受康熙帝賞識。
- 此外，湯若望等人積極結交權貴名流，擴大天主教的影響力。例如，湯若望曾在明清易代之際，因其天文曆法上的貢獻而免受政治動盪的牽連，並繼續在清廷中維持重要地位。這些努力使天主教在中國得以穩步發展。
- 耶穌會會士採用的「文化調和」策略，成功化解了中外文化的差異，打破了傳統禮儀與天主教教義間的對立；而「以學輔教」則憑藉西方科技知識贏得統治者與士人的支持，為天主教的發展鋪平了道路。這些策略不僅避免了宗教衝突，也促使天主教在明末清初的中國得以蓬勃發展，成效卓著。

單元六：女性社會地位：傳統與變遷

16. (a) 為何中國古代讓婦女接受教育？根據資料一，並援引史實，加以分析。(10 分)

- 中國古代講究「女學」，尤其重視以道德教育為核心的婦女培養。根據資料一，教育婦女的目的主要在於使她們「知書達禮」，即通過學習文化知識來理解和實踐「三從四德」這類規範，達到「事人之道」。這種教育旨在塑造婦女的家族角色，使她們成為賢妻良母，穩定家族秩序，而非開發其智力或增進獨立性。
- 例如，東漢班昭所著的《女誡》，便是教育婦女如何謙恭順從、侍奉夫家，並強調婦女應遵守「夫為妻綱」的倫理規範。唐代的女學教材如《列女傳》多以歷史上的賢妻孝母為榜樣，教育婦女如何在家庭中扮演符合社會期待的角色。這反映了古代社會對婦女的期望，重點在於她們的道德修養與家庭責任，而非知識的拓展或社會地位的提升。

(b) 「三從」如何改變中國傳統婦女的生活？根據資料一、二，並援引史實，分析其正面與負面影響。(15 分)

- 根據資料二，「三從」使婦女在父、夫、子三者的庇護下獲得生活上的依靠。中國傳統社會以家庭為核心，婦女的生活依附於家庭權威。正如資料二所述，婦女自幼接受順從教育，已習慣在服從中獲取保護。這種模式雖然壓抑個性，但也為她們提供了一種穩定的生活方式。例如，歷史上許多婦女因堅守「三從」而獲得社會的尊重。南宋時期的「烈女」事跡被編入《貞烈傳》，成為婦女堅守節操的典範。這些婦女通過順從與自我犧牲，贏得「立節揚名」之機會，成為家族與社會推崇的榜樣。
- 然而，「三從」也帶來了明顯的弊端。根據資料一與二，婦女被教育如何順從，但從未學過如何看待與使用自由，導致她們缺乏自主性與獨立性。資料二指出，一旦失去父、夫、子的依靠，婦女往往陷入無所適從的困境。例如，明清時期一些寡婦因夫家無人照顧而生活困苦，甚至被迫改嫁或淪為奴婢。
- 此外，「三從」壓抑了婦女的個性發展，使她們無法參與更廣泛的社會活動。即使有才華的婦女，也只能局限於家庭內部。例如，清代才女柳如是雖能詩文，但仍需依附於丈夫錢謙益，未能獨立發揮其才華。這反映了「三從」對婦女自由的壓制。

17. (a) 為何明代貞節旌表制度受到重視？試根據資料一，並援引史實，加以說明。(10 分)

- 根據資料一，貞節旌表制度是儒家倫理的重要實踐，通過表彰節烈婦女來宣揚「三綱五常」中的婦德理念。地方官府通過旌表節烈婦女，「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亡守志者，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除免本家差役。」將其事跡記錄於地方志或樹立牌坊，對社會具有強烈的教化功能，有助於穩定家庭與社會秩序。明代節婦遂遍及各地，在《明史》中，被列入《列女傳》的女性幾乎都是貞節烈婦，以貞節牌坊表彰節婦更在這一時期達到高峰。
- 資料一提到，節烈婦女的家庭往往能享受減免稅賦與差役的優惠。在「勞役繁重、苛政猛於虎」的古代社會，除免差役有極大的吸引力。在明代稅役負擔沉重的背景下，這種實利成為家庭支持婦女守節的重要動機。例如，地方志記載一些家庭甚至因婦女守節而獲得經濟上的改善，進一步推動了旌表制度的普及。
- 明代政府鼓勵貞節旌表，既是為了穩定社會秩序，也是為了強化中央集權對地方的控制。地方官員通過旌表節烈婦女，既能完成中央布置的教化任務，又能提高自身的政績，促使此制度受到重視。

(b) 貞節旌表制度如何推動節烈風氣？試根據資料一、二，並援引史實，加以分析。(15 分)

- 根據資料一，節烈婦女的事跡常被記錄於地方志中，並授予牌坊或匾額，成為家族榮耀的象徵。此外，節烈婦女的家庭還能獲得免稅免役的實利，這些激勵措施使得守節婦女被視為家庭的道德榜樣與經濟貢獻者。例如，一些地方志記載，家庭因婦女守節而免除徭役，進一步推動了節烈風氣的盛行。
- 資料二指出，明清時期儒家倫理強化了婦女守節的道德要求。地方政府通過旌表制度，將節烈婦女塑造成社會的道德典範。例如，《貞烈傳》與地方志中頻繁記錄的烈女事跡，成為後人學習的榜樣，進一步推動了節烈觀念在社會中的深入人心。
- 在旌表制度下，使不能參與科舉考試當官的女性，也有光大門楣的機會。因此，婦女在丈夫死後大多會選擇堅持守寡，以期待那可能是遙不可及的旌表，使自己在夫家中獲得較高的地位。
- 改嫁與再嫁會受到社會輿論的譴責，尊崇貞女節婦的觀念成為一種風習而擴大至各個社會階層。學者董家遵在〈歷代節烈婦女的統計〉中，統計出節烈婦女的人數，從宋代的 274 人，急增至明代的 35 829 人，甚至有婦女被逼迫殉死以獲得旌表，可見旌表制度使貞節婦女大幅增加。

18. (a) 根據資料一，試以 1950 年代婦女參與經濟活動的情況，證明資料一中「中共和政府高度介入婦女運動」的說法。(15 分)

- 1949 年後，中共提出「男女平等」的基本政策，並頒布 1950 年的《土地改革法》，婦女和男子同樣獲得分配土地。在中共和政府動員下，促使農村婦女參與農業生產，改變了傳統的家庭勞動模式。例如，婦女被要求加入農村合作社，與男性共同完成農業生產任務。
- 在城市，政府通過國家計劃經濟的安排，積極動員婦女參與工業生產。例如，1950 年代初期的大規模基建項目中，婦女被廣泛招募進入工廠，從事紡織、輕工業等工作。據統計，1950 年代中期，城市女工的比例顯著上升，婦女逐漸成為勞動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部分婦女更響應政府「以重工業為工業建設的重點」的號召，加入過去婦女從未涉足的生產領域，例如擔任火車司機、拖拉機手、地質工作者等職務。
- 1958 年，中共為推動「三面紅旗」政策，加速實現「大躍進」的經濟目標，開始大規模動員婦女參與社會生產活動。為了讓婦女擺脫家務勞動，人民公社普遍建立了公共食堂、托兒所及縫紉組等集體福利設施，旨在解放婦女的時間與精力，使她們能夠「走出家庭」，投身各類生產任務。在城市，婦女被動員參與工業生產和服務業工作，成為工廠中的重要勞動力；在農村，婦女則主要參與農業生產、水利建設及畜牧業等勞動。此外，許多婦女還積極投入「全民大煉鋼」運動，以達成國家設下的鋼鐵生產指標，充分體現出中共在「大躍進」時期對婦女勞動力的高度重視。

(b) 根據資料二，援引史實分析從改革開放至 20 世紀末，中國婦女教育的發展情況。(10 分)

- 改革開放後，中國政府大力推行「九年義務教育」，1986 年的《義務教育法》規定 6 歲以上兒童，不分性別，應當接受、民族、種族、應當入學接受義務教育；1992 年的《婦女權益保障法》，保障婦女在入學、升學等方面與男子享有平等的權利。此外，政府也採取各種措施，幫助貧困地區或貧困家庭的兒童入學，又發展婦女成人教育和職業教育，增加成年婦女接受教育的機會。使女性受教育比例顯著提高。例如，農村地區的婦女在「掃盲班」中學習基本文化知識，逐步提高了受教育水平。至二十世紀末，中國婦女教育有了顯著的發展，例如婦女文盲率下降，1998 年適齡女童入學率已達 98.9%；婦女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亦大幅提高。
- 然而，中國婦女在教育上仍受到性別歧視。特別是在一些貧困家庭，家長會選擇把接受教育的機會留給男性，令女性升學受阻，不少學齡女童因而失學或被迫輟學。在較為貧困的農村地區，這種現象更為常見。故截至二十世紀末，中國婦女的整體教育水平仍低於男性。